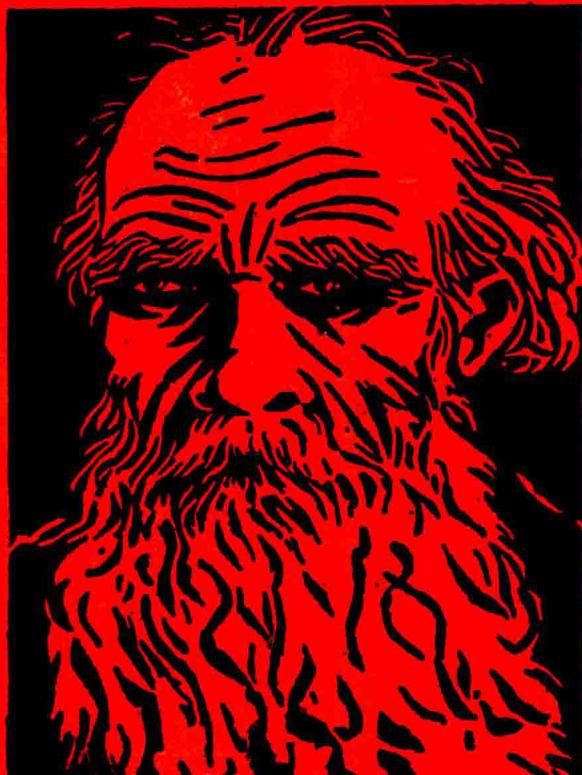


列夫·托尔斯泰 比较研究

倪蕊琴 主编

LEV
TOLSTOY



列夫·托尔斯泰 比较研究

倪蕊琴／主编

纪念伟大的
俄国作家
列夫·托尔斯泰
诞生160周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

倪蕊琴 主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插页：2 字数：280千字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本

ISBN7—5617—0355—4/I·027 定价：2.70元

前　　言

开设了几年关于托尔斯泰的选修课，同志们鼓励我写一本书，但我一直感到胆怯。托尔斯泰是位伟大的作家，全世界都在研究他。在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出版过几种论文集和评传。怎样选择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才能使学生和读者有所启发、有所得益呢？近年来我接触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方法，一面学习、一面摸索、运用，写了一批文章，其中有几篇被一些刊物选用，他们肯定了这一方法，认为是对古典作家研究有所开拓。这种评价无疑给了我勇气，于是我决定从一个新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编写这本书。有了总体设想以后，我约请了在这方面有基础、有研究的同志来共同分担选题，并吸收部分较全面的研究资料形成有机整体。谨以此书来纪念列夫·托尔斯泰（1828—910）诞辰160周年。

基于列夫·托尔斯泰在文学上的特殊地位，在构思本书的编写体例时，我将主要内容归为四个大类。首先是托尔斯泰与同时代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其中又着重从长篇小说入手。十九世纪下半叶可以说是俄国长篇小说家群峰竞秀的时代，而托尔斯泰则是群峰之巅。俄罗斯的长篇小说又是以深刻揭示人的心灵奥秘而激动读者的。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艺术功力不相上下。然而两位大师笔下的人和世界竟是如此悬殊，千差万别。记得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正是因此而认为一般人是不能同时爱他们的：凡对托尔斯泰亲近的人，就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疏远，或者相反。而对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来讲，情况就不同了，我觉得如果不研究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充分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可能充分理解托尔斯泰。所以本书第一部分我们着重对这两位作家的长篇艺术和

心理描写方面进行了比较，因为在这种对比分析的过程中，他们各人的创作特色才显得更为突出、鲜明、具体。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整体中是后起之秀，从地域和历史上看，她基本上属于欧洲文化传统，托尔斯泰与欧美文学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就决定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重点论述托尔斯泰和欧美文学。然而对我国研究者来讲，这一领域难度较大，也较少涉足，在这里我们只论及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司各特和霍桑之间的创作联系，还有许多专题有待于我们去探讨。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托尔斯泰和中国”。这是我国托尔斯泰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课题。我们的老一辈学者专家早已开始这一工作，我们愿在他们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大家知道，托尔斯泰是欧洲作家中最具有东方气质的一位。而且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我国的古典哲学，他汲取了孔、孟、老、墨各家的学说，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托尔斯泰主义。正因为如此，我国现代作家对托尔斯泰从气质和心态上感到亲近，受到较大影响。这一部分中我们从托尔斯泰与现代作家（茅盾、巴金等）和先秦诸子（老子、墨子）两大方面加以阐述。

衡量一个作家，特别是古典作家的艺术生命力的强弱，最好的标志就是看他对我们当代的影响。本书第四部分“托尔斯泰与当代”就是在这方面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但限于水平和时间，我们仅仅做了初步尝试，考察了托尔斯泰传统在他本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由于受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左右，文学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附庸，五十年代以后，文学恢复了自身的价值，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其中托尔斯泰式的气势磅礴的史诗构思，托尔斯泰式的全人类意识、永恒主题、探索主人公等等都被重新认识和发展，苏联文学越来越接近托尔斯泰坚持的文学为陶冶和完善人性的使命观。

考虑到这本书要作为选修课的辅助教材，我选了几篇有关托尔斯泰研究的资料，其中有已发表过的论文，也有专为本书而写的文章（如《苏联安娜形象研究简评》，因为安娜形象在研究者中争论较多，特此加以评述）一起放在附录中。

我所约请的本书其他作者，都是对托尔斯泰特别爱好并有独到见解、绝大部分是有硕士学位的中青年研究者，他们今后将会在这一领域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编写此书是个尝试，若有什么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在目前出书难的情况下，我代表此书的全体作者感谢华东师大出版社给了我们这样好的一次机会。

倪慕琴 1988.6.

于华东师大中文系

目 次

前 言

第一部分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拓展 倪蕊琴 (1)

探索灵魂深处的奥秘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特色 ——

..... 倪蕊琴 (17)

长篇结构模式的突破

——谈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对映”、

“对位”结构与戏剧处理 —— 陈建华 (38)

第二部分

托尔斯泰与历史小说的司各特传统 宋大图 (57)

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小说

创作艺术的若干比较 蒋连杰 (69)

抒写内心世界，忏悔人生罪恶

——《复活》与《红字》剖析 兮西民 (96)

第三部分

从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到

田汉、夏衍改编的同名剧本

——结构、人物和主题的比较 倪蕊琴 (106)

创作个性·精神探索·形象体现

——巴金和托尔斯泰创作个性初探 倪蕊琴 (113)

- 托尔斯泰和茅盾的文学创作特色 吴承诚 (135)
托尔斯泰和老子 周均美 (149)
爱的启示
——托尔斯泰“人类爱”与墨子“兼爱”
思想的比较 —— 桂未柔 (165)

第四部分

- 当代苏联文学中道德主题的深化和
托尔斯泰传统的发展 倪慕琴 (181)
“小型化”史诗的诞生与
传统长篇史诗的回顾 倪慕琴 (192)
永恒主题及其时代具体性 汪一新 (204)
两个探索者?
——彼埃尔·别素霍夫与葛里高利。
麦列霍夫形象对比 —— 章海陵 (224)

附 录

- 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 陈 燮 (244)
我国解放后托尔斯泰研究述评 刘洪涛 (292)
苏联安娜形象研究简评 朱春荣 (309)

第一部分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拓展

倪蕊琴

19世纪下半叶新兴的俄罗斯文学开始产生世界影响，号称俄国文学三巨头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以自己的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征服读者的。

俄国的长篇经过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系列小说(《当代英雄》)、果戈理的散文体叙事诗(《死魂灵》)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而进入现代欧洲模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则为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发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道路。

作为长篇小说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处在俄国从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两位作家都面临着如何理解并表现这个充满矛盾和混乱的动荡时代的任务。

身为上等贵族地主，正享受着婚后家庭幸福的托尔斯泰伯爵，首先思考和感到不安的是贵族在俄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问题。于是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俄国历史上贵族的黄金时代——1812~1825年。当然，《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在这部宏伟的史诗中所达到的远远超出了他最初的构思，他认识到作为整体的人民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而经历了长期监禁、流放，受尽了身心的

折磨，深刻体验到底层人民的苦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敌视以及社会道德沦丧更为敏感。他痛心地发现周围的人们“基本的社会信念摇摆不定”，相互不理解，缺乏道义的一致。根据他对现实的这一基本认识以及他对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原则，《罪与罚》的作者满怀激情地批评了当时的贵族作家不关心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他说：“我们一些高度艺术地描绘了中上层（家庭的）生活的有才华的作家托尔斯泰、冈察洛夫以为，他们描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而我以为，他们才描绘了特殊的生活。相反，他们的生活是特殊的生活，而我的生活是一般的生活。后代会证实这一点，他们会比较公允，真理是属于我的。”^①他还指出俄国文学还没有对处于混乱和变动中的现实进行研究和作出解释。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托尔斯泰的批评有失偏颇。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他在创作上的这种执着追求，力求尽量广泛地反映现实，力求窥探现代生活的发展方向和规律。而实际上托尔斯泰也在苦苦地探索着，尽管是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着眼的。

这也许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两位同时代的大作家，曾经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里，甚至出入于同一个公共场所，却终生没有直接相识交谈过。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如此显著，但在创作中却常常出现吻合或殊途同归现象。他们第一次构思上的相会是在《白痴》和《安娜·卡列尼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一个人物来概括这个时代的特点：“现在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翻过来了。”同样，托尔斯泰也通过作品主人公列文说：“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农奴制的崩溃，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动摇了维系着人们关系的各种准则，动摇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基础，“贵族之家”瓦解了，家庭丧失了过去那种确定的性质，成了所谓“偶合家庭”。这就是潦倒不堪的伊伏尔金将军和他的外遇玛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页。

尔法·鲍里索夫娜，以及他的备受折磨、千方百计保持体面的妻子尼娜·阿历山大洛夫娜。而这个家庭的年轻成员几乎都有一颗扭曲的心：骄傲到病态的女儿瓦尔瓦拉，特别是一心想出人头地，爱钱如命的儿子茹纳，他准备接受七万卢布，娶被托兹基抛弃的情妇娜司泰谢·费里帕夫娜。可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一个和谐、安宁的家庭，没有一对正常相爱的男女，他们互相猜忌，甚至相爱时也用折磨、憎恨、愚弄的方式表现出来（阿格拉娜·叶潘钦娜对梅思金公爵，罗果京对娜司泰谢，娜司泰谢对梅思金公爵）。

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时，作者明确地概括说：“为了使作品写得好，应该爱其中主要的、基本的思想。譬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我爱的是家庭这个思想，在《战争与和平》中我爱的是……人民这个思想。”^①这一主要思想在作品中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为全书情节开端的第一句话是：“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这句话象提纲张网，拉出一幕幕贵族家庭的悲欢图：柳里克皇室后裔奥布浪斯基与家庭教师发生暧昧关系，妻子获知后，家庭面临危机。为调解兄嫂纠纷的卡列宁夫人，在莫斯科之行中与近卫军官渥伦斯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这既改变了吉提的命运（她为了渥伦斯基，刚刚拒绝了列文的求婚），造成吉提和列文的精神危机；又种下了安娜悲剧的祸根。于是，一连串家庭都混乱了。在彼得堡，一位显贵带着自己的成年儿子出入于他情妇家，以增长儿子的见识；交际花别特西公爵夫人在家宴上公开招待情夫；慈善家莉济亚·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在安娜离家后主动充当卡列宁的“管家”。在这里，混乱的家庭无疑是混乱的社会、混乱的时代的缩影。而且史诗作家托尔斯泰善于对俄国现实作全景观察，从经济、哲学、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各个方面提出问题。

^① 见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年谱》1958年版，第468页，译文见《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42页。

《安娜·卡列尼娜》又是作家在艺术表现方面最花功力的一部作品，无论就人物形象，作品结构等方面来看，其成就都远远超过《白痴》。

而“偶合家庭”的主题，却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提出的，他早在《罪与罚》中就已经有相当充分的描绘。读者不会忘记那个靠索尼亚卖身活口的马尔拉美托夫的“家”；也不会忘记那个由女地主用钱买去当丈夫，根据合同在一起生活的潦倒贵族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家”。但是作家注意的中心并不是偶合家庭本身，他更关切的是偶合家庭中的年轻一代的成员。他通过从拉斯柯尔尼科夫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坎坷的命运揭示了时代的矛盾和动荡不安的氛围，下层人民的苦难，人们在道德信念上的动摇、迷误和探索。他强调，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一工作是不容易讨好的，也缺乏优美的形式。而且这些人物……还处于变化状态，因此在艺术上不可能是完美的。可能犯重大错误、可能有夸大、疏漏。会有太多的猜测”。^①

屠格涅夫称托尔斯泰是“思想的艺术家”，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是俄国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小说家。两位大师都终生孜孜不倦地探求人生的根本意义，思考人与社会、人与人类的全面关系，窥察人的内心深处的奥秘。体现在创作中就是从道德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永恒的主题：生与死，善与恶，灵与肉，罪与罚，爱与恨，复活和永生……可以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复活》是两位长篇小说家创作构思上的又一次相会和对话。

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包括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都犯了杀人罪。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是把人分为两类：“超人”和“凡人”，前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不受一般法则的制约。为了做一次试验，看自己到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见《俄国作家论文学劳动》第3卷第151页，苏联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译文见《论文学创作》，冯增义译，《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第159页。

底属于哪一种人，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老太婆是个无足轻重、甚至对社会有害的人。但凶杀行为意味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跨过了道德准则的界线，他忍受不住良心的痛苦。结果他的理论折磨了自己。所以，作家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根源在于他不相信永恒法则，他心中没有上帝。伊凡·卡拉马佐夫是弑父行为的思想上的凶手。他的理论是：他不相信上帝和他的永生的信念，而假使没有永生，就无所谓道德，因此，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甚至杀人。斯麦尔佳科夫就是这一理论的执行者。同样，老卡拉马佐夫也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但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违反了维系着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他们都必然遭受自我毁灭的命运。

涅赫留道夫的犯罪和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一度堕落属于另一种性质的罪。然而究其根源，在对待上帝和永恒法则这点上，都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同出一辙。大学生时代的涅赫留道夫对姑妈家的养女兼使女卡秋莎产生过纯洁、真挚的爱，这种爱激发他爱周围一切人，愿为别人做好事，愿使自己变得更完善。这时的他一切行为听凭良心的声音，精神的人主宰着他。三年的近卫军官生活腐蚀了他的灵魂，他象别的贵族青年那样一味追求个人享乐，内心的声音被压抑下去，动物的人在他身上占了上风，玷辱了卡秋莎，犯下了亵渎上帝的罪行。而卡秋莎在意识到她已被涅赫留道夫忘记、抛弃的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便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怀疑人与人之间可能相爱。她恨，她要求报复，于是她堕落了。因此只有当涅赫留道夫良心发现，真诚忏悔，以行动赎罪，决心娶卡秋莎，而卡秋莎被感动，开始原谅他，为了真正的爱他而拒绝与他结合时，他们两人在精神上复活了。

既然犯罪的根源在于人违背了上帝的法则，因此惩罚不仅来自法庭、监狱等暴力措施，而且，来自人的自身，对人们来说，最沉重的惩罚莫过于良心的审判。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仿佛有一把剪刀剪断了他和人们的联系，他不再有权利爱母亲和妹妹，更没有权利得到她们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通过苦难灵魂能

够得到净化，当心灵重新被爱溶化的时候，精神就开始复活了。伊凡·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根本没有受到法庭的审判，他们之间的相互揭露，每个人对罪行的自我意识，使他们在精神上完全崩溃了。而被控弑父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却在这场灾难中灵魂受到震撼，他自愿背负起十字架，通过火海奔赴新生之岸。他并不是“伏法”，相反，法庭往往做出错误的判决。两位作家都着力描绘了法庭审判，《复活》的作者展现的是一幅活生生的百官现丑图：在那里，一切都是虚伪、颠倒、残酷、不公正的。在那里，无罪的卡秋莎押在被告席上受审讯，被错判；而造成她堕落的罪魁祸首涅赫留道夫公爵却高高坐在陪审员的宝座上。法官们是玛丝洛娃呆过的妓院的常客。所有那些扮演正义主持者角色的官吏们（包括神职人员）或者考虑私利，心不在焉，或者炫耀自己的知识，夸夸其谈。实际上是作家以人民的名义在审判“审判者”。从法庭向上向下伸延，凡被沙俄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带动下的大小官僚，从大法官、司令、部长到监狱长、押送官都是缺乏人性、与民为敌的。这样，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植永恒主题于现实基地之上，从宗教伦理道德出发达到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所勾画的审判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场景，采取了全然不同的视角。他通过法庭定罪这一关键性的、涉及所有当事人切身利害，触动他们灵魂深处的事件，探讨犯罪心理，罪人性格因素，揭示偶合家庭年轻一代成员被扭曲的心灵的奥秘。

二

如果说“长篇小说是集中描述个别人物的命运，人物性格及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长篇叙事体作品”^①，那么，托尔斯泰首先以再现“心灵的辩证过程”而使人物性格无限丰满，使人的内心生活第一次得到这种独立存在的意义。托尔斯泰从青年时

^① 见《苏联文学小百科》（俄文版）第6卷第350页。

代起就有过大量的自我观察，自我分析（从1847年开始的日记最真实地记录了他的内心生活）。他常常追逐着一种思想、一种感情产生、变化的轨迹，捉摸着心理自我运动的过程，探寻它的表现形式，它的活动规律。这种从自身实验得出的结论，当然具有作家个人的特征，但是在每一个别的人身上，同时具有普遍性。托尔斯泰从自我分析开始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因而，主要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自我表现性质。从自传性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的伊尔倩耶夫，《一个地主的早晨》、《琉森》中的涅赫留道夫，《哥萨克》中的奥列宁到三部长篇巨著中的男主人公构成托尔斯泰式的人物画廊。他们象作家本人一样，具有上下求索精神，心灵纯洁，天性高尚，健康质朴，是“势所必然地在大自然的心窝里定居下来”的“自然人”。同为心理分析大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内心的奥秘观察得也许更为深邃，更为无情，他仿佛要把人心灵深处的每一个角落都彻底翻抖出来，连最细小的隐私也不容躲藏。按照一般规律，谁如果没有在自己内心研究过人，那么就无法深刻了解人们。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进行过长期的自我分析。但与托尔斯泰不同，他尽量把自己隐蔽起来，从不直接露面，在他所塑造的几十个鲜明形象中没有一个是自我的化身，几乎都不带自传性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人公，概括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心分裂的所谓“两重性人物”，他们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斯达弗罗金、韦尔西洛夫、娜司泰谢·费里帕夫娜、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格鲁申卡等。另一类则是作家的理想人物，上帝的使徒：索尼亚、梅思金公爵、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佐西马神父等。这第一类人物形象可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如果我们同意福克斯的说法，认为长篇小说“只能在人和社会之间失去平衡的社会里得到发展”，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重性人物就是最典型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重复的个性，他们中每个人的命运都极为奇特。同时在他们的性格中又展示了人和

社会、人和世界的全面关系。拉斯柯尔尼科夫心灵善良、敏感，对人富于同情心。但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使他倾倒于超人理论。这个破衣烂衫、饥肠辘辘的“英雄”，躺在象棺材一样阴暗狭窄的小阁楼里思考着他的杀人计划。犯罪后，他有充分的论据证明他的行为的合理性、动机的高尚：一个微不足道的放高利贷的孤老太婆，占有对她毫无用处的大量银钱，但这些钱却可以用来挽救几个濒临崩溃的家庭，拯救多少无辜的孩子。然而他的心灵却承受不住道德的重荷。而卡拉马佐夫式的性格，用作品中检察官的语言来表达，则是“能够兼容并蓄各式各样的矛盾。同时体味两个深渊，一个在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他们是“善与恶的奇妙的交织体”。因为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都存在着两种冲突的力量：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残忍、卑劣事物的向往。正如德米特里所承认的那样：“理智认为是耻辱的东西，心灵却觉得整个儿是美。在淫乱中也有美吗？请相信我，在大多数人看来，在淫乱中存在着美……。”他们都是“偶合家庭”的成员，“被遗弃的人”，都没有体验过家庭的幸福与温暖。特别是女主人公们都自幼受到欺凌和侮辱，稚幼的心灵遭到深重的创伤，对受侮的意识越强烈，对于社会的复仇要求也越强烈。美丽、聪颖、热烈追求纯洁爱情的娜司泰谢，刚进入少女期就落进陷阱，从此她表面上过着上流社会的豪华生活，内心中却痛苦挣扎。最后她虽然当众揭穿了托兹基的阴谋和全部罪行，但却是以公开标榜把自己出卖给富商罗果京为代价，她摆脱了一种耻辱，又陷进另一种耻辱，从一种不幸转向另一种不幸。而卡捷琳娜大胆果敢，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为了挽救父亲的名誉，不惜冒险。她在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恩惠”中意识到轻视和侮辱，却自愿当他的未婚妻，用加倍的补偿，在精神上进行报复，对所恨的人施以慷慨资助，对所爱的人百般折磨（也是自我折磨），强迫自己忠于所扮演的角色。与托尔斯泰的人物相比，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人物都带有病态的狂热，甚至歇斯底里。

作为长篇小说家，托尔斯泰身上存在着强烈的史诗因素，他总是让他的主人公的命运与民族的、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人与人之间的博爱与和平中得到心灵的和谐。在祖国受到侵略，民族面临灾难的时候，两对仇人相逢了：彼埃尔·别素霍夫与道洛霍夫拥抱言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为成了残废的阿纳托尔·库拉金流下同情的泪。在为国捐躯和服从神圣法则的感召下，心灵达到了一致。列文的精神危机只有在与农民共同的体力劳动中得到解脱，在老农的生活启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上帝。”）下找到出路。涅赫留道夫从为个人向卡秋莎赎罪发展到为整个剥削阶级向人民大众赎罪，最后获得灵魂净化，精神复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更为活跃的则是戏剧因素。作家把他所描写的人物当作主体，不是象传统的小说中那样由全知全能的作者安排好的客体。作者赋予他的人物更多的独立性。作家和主人公具有同等权利，每个人用自己的声音去参与论争。按照苏联评论家巴赫金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每一个主人公都被“狂热的思想”和个人关于世界的“真理”所控制，因而他们全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关世界、人和上帝的“大型的对话”。他的长篇小说“真理”的最大限度的“复调”、“多声部”就是由此而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世界是极为复杂的，真理是相对的，任何“个人的”真理都有局限性，任何人永远也不可能在自己的狭小范围内看到生活的全部内容，因此，他认为，个人的真理应该向他人的真理敞开，这就需要进行不断的交流和对话。而托尔斯泰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长篇小说的任务——即使说它是表面的任务也好，就在于描写一个人或者许多人的整个一生，因此写长篇小说的人对于生活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一点，必须具有明确而坚定的概念。”^① 所以长篇小说家托

^① 译文转引自贝奇柯夫著《托尔斯泰评传》，吴均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